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制度建设研究

——中国“渐进式改革”经验与借鉴\*

毛振华 袁海霞

**[提 要]**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资本流动是全球化背景下要素流动配置的必经之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正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国际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促进其资本形成、技术水平提升等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沿线涉及诸多国家,环境相对复杂,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差巨大,投资环境大不相同,地区安全风险频发等,这些国家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候面临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质上与沿线大部分国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欠缺相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紧密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以及吸引FDI的成就与渐进式改革密切相关。中国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经验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进行制度改革提供有效的借鉴,即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真正的市场化主体,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互助等。

**[关键词]** 国际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制度改革

## 一、引言

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是时代的主题,也是未来的趋势,资本的输出和流动是资源要素的全球化配置的重要方面。历史上,资本输出和扩张与国家、大公司发展紧密相连。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流动(以股权投资为主),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定义国际直接投资,指出投资机构对本国之外企业进行投资活动,并持续获得利润,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增加投资机构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可以认为,资本的跨国流动已经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交往中最活跃和最引人注目的因素。本文讨论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主要是指为了寻求较高回报率和较好的投资机会,资本在国家之间的流入、流出活动。

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有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资本形成,改善要素配置;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扩散、资本的溢出效应来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具有正向作用。而这个过

\* 毛振华,中诚信集团,武汉大学董辅初经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袁海霞,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邮政编码:100010,电子信箱:yuanhx1981@163.com。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建议,感谢杨小静后期参与修改做出的贡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程中,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承担者。

本文的研究逻辑是,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国际资本流动是全球化背景下要素流动配置的必经之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正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国际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促进其资本形成、技术水平提升等方面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沿线涉及诸多国家,环境相对复杂,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差巨大,投资环境大不相同,地区安全风险频发等,使得这些国家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候面临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质上与沿线大部分国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相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的欠缺紧密相关。国际直接投资落地最终取决于风险与收益的匹配,从降低风险,提高对国际资本的吸引来看,周边国家需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促进投资环境的规范和成熟。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渐进式改革与开放的成功经验可以为这些国家提供参考和借鉴。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9月和10月期间,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思路。近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了广泛的投资和贸易合作。“一带一路”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实力不强,而且国别之间差异很大,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51个国家的人均GDP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占比高达78%。从世界经济的历史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图1所示)。对于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整体水平相对滞后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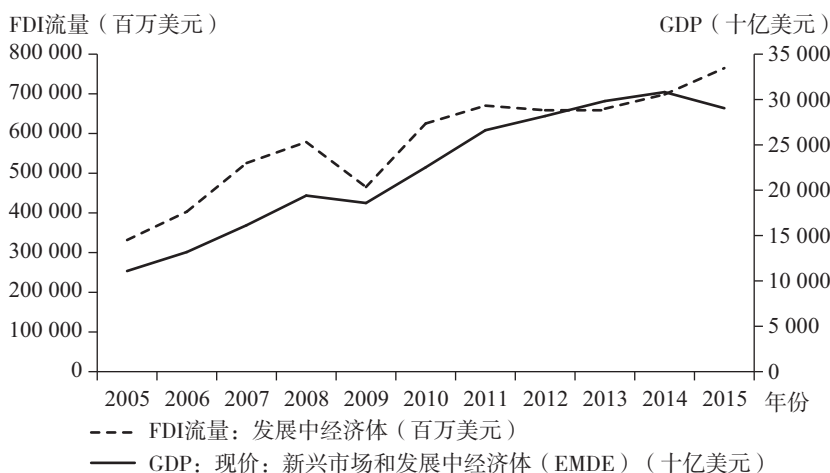


图1 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量与GDP走势

从既有的研究文献和实际经验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可以从资本形成、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就业等四个方面形成积极促进作用。<sup>[1][2][3]</sup>第一,国际直接投资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本形成。国际直接投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资本来源。一方面,国际直接投资能够直接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扩充资本配备,调整有

效要素比例,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初始要素的生产率。另一方面,国际直接投资也常常会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和企业追加投资,从而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前的资本存量。第二,国际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进步。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载体,拥有世界顶尖的技术。在全球扩张过程中,跨国公司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技术上的援助或供

给,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进步。第三,国际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供给方面来看,国际直接投资通过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本要素的存量,改变其初始禀赋条件,加速产业结构的演进。同时,劳动者的素质也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需求方面来看,国际直接投资通过积极的经济效应,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民收入,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消费和投资,形成新的需求热点,间接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变革。第四、国际直接投资在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后,会产生就业创造效应。主要体现增加就业数量和提高就业质量两个方面。

根据国际经验,可以预料到,国际直接投资将会极大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但也应当关注到这些国家的投资环境相对处于较低水平,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将面临较大的风险。

###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与其制度不完善紧密相关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以及技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最终都体现在对于投资风险和收益的决策环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研究影响国际投资的因素。从投资国的角度看,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理论有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上述理论进行综合,他认为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前提。<sup>[4]</sup>从东道国的角度看,库伦(Culem)认为市场规模与市场增长率、单位劳动成本、贸易流动以及规模经济可以构成FDI的主要影响因素。<sup>[5]</sup>考夫曼等人(Kaufmann et al)从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法律完善程度、腐败情况、监管负担、言论自由、政府工作效率等六个方面来衡量政府的政治环

境,研究结果显示政治环境显著影响东道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sup>[6]</sup>姚利民和孙春媛的研究表明,贸易程度、两国间距离、技术差距、劳动生产率差异等对FDI流动具有重要影响。总体来看,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包括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汇率水平、贸易水平、治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等。<sup>[7]</sup>

实际上,“一带一路”沿线涉及诸多国家,环境相对复杂,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差巨大,投资环境大不相同,地区安全风险频发,等等,使得这些国家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候也面临上述问题,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水平、治理水平等,这些均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方面,这些问题本质上与沿线大部分国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相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的欠缺紧密相关。在综合学界的理论和实证的文献对影响国际投资因素的研究基础上,本部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制度障碍进行详细分析,主要从市场体系、政治风险、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财政金融制度、基础设施水平、参与国际规则的情况等因素全方位进行研究。

#### (一) 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合理制度安排的欠缺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制约因素

从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来看,制度安排或者说经济制度和体制对于投资风险的影响尤为关键,在统一、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中,规范、完善的法律环境、相对统一的市场规则以及稳定的市场环境等可以降低跨国资本流动过程中面临的制度风险。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直接投资得以发生的条件是兼具内部化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其中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除了自然禀赋、基础设施、市场需求、运输与通信成本、贸易壁垒等经济因素之外,还包括经济体制、政府政策、市场环境、法律秩序等影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因素。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决定了经营复杂和不确定性的程度,市场化、对外资持欢迎态度的制度是对外投资的拉动力。鲁明泓的研究发现,政府高效、运营透明、法律完善的国家吸收了较多的国际直接投资。<sup>[8]</sup>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来看,由于大

部分国家处于发展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体系以及经济制度相对发展较为滞后,资本流入面临的市场环境和市场规则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带来国有化等投资无法收回的风险。<sup>[9]</sup>在过去几年,这些问题使得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诸多困境,导致投资失败。从本质上来讲,“一带一路”战略目的是通过沿线周边国家发挥比较优势,通过互助合作,达到资源优化配置以及经济结构升级,从而实现共同发展。然而,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合理制度安排的欠缺带来的制度风险和市场风险成为目前各国资本互通以及产业合作乃至全球化发展中双边合作以及多边合作的最重要制约因素和关键障碍。

## (二) 政治风险是制约国际直接投资落地的重要因素

对于国际直接投资而言,政治风险从来都是影响投资是否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鲁特(Root)从不确定性的角度,认为政治风险是本国或国外能够引起国际商业运作的利润潜力或者资产损失的任何类型的政治事件的出现,并将政治风险区分为宏观风险和微观风险。<sup>[10]</sup>西蒙(Simon)则认为,政治风险是政府对商业运作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和政策。<sup>[11]</sup>从理论上讲,政治风险虽然与制度风险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本文认为政治风险更侧重由于宗教以及民族冲突、地缘政治冲突、东道国政权机构变更或者更迭、法治情况不稳定、改革进程及力度超出预期等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发生的收益和成本内容与预期相比出现较大的偏差,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主要包括外部的大国政治博弈带来的政治风险以及国内的政治风险两类。

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占据重要地理位置,与美国等大国政治关系十分复杂。而这些大国的战略导向、政策立场以及未来判断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具有重大影响。与此同时,沿线国家种族和宗教的多样化冲击,政权更迭频繁,对于国际直接投资安全性的保证不确定性加大。从各国的发展和改革情况来看,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转轨发展时期的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

等问题突出,沿线国家的这种政局动荡常态化、政权更替频繁化对“一带一路”战略推进构成系统性政治风险。根据中诚信国际主权信用评级结果(政治风险分布如图2所示),从沿线国家的对比情况来看,吉尔吉斯斯坦、肯尼亚、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以及柬埔寨等中亚、东南亚及非洲国家相对风险较高。<sup>[12]</sup>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时则处于劣势。

## (三) 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经济风险与财政金融风险也给国际直接投资带来一定困难

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由于东道国宏观经济基本指标的变化(诸如经济增长、通胀水平、就业等)将导致外商投资面临损失的可能性,这种损失的可能性称之为经济风险,经济风险也是这些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阻碍之一。从理论上讲,东道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其特定的经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交易成本,从而对投资行为和投资收益形成影响。艾乍曼等人(Aizenman et al)研究了FDI与东道国宏观经济风险之间的联系,认为不同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受到宏观经济风险影响不同。<sup>[13]</sup>而高希和李(Ghosh and Li)通过建立宏观经济变量脉冲反应变量模型,研究了中东北非国家宏观经济变量对投资带来的冲击作用。<sup>[14]</sup>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落差较大,相当一部分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体制改革均处于转型过程中,部分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对外依赖性较强,缺乏较强的自主性,受世界经济影响较大。与此同时,配套的制度变迁、结构调整以及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或者是不对称,也会带来宏观经济风险,即对外投资损失的可能性。经济风险较大的国家,国际直接投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会更大。从中诚信国际主权评级结果来看(如图3所示),产业贸易发展相对滞后、综合实力相对较弱的塔吉克斯坦等国经济风险相对较高,而经济实力较强的部分欧洲国家,相对经济风险较小。对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柬埔寨等东盟九国,其内部环境的不稳定也加大了经济风险。总体而言,由于经济发展落差较大、自然禀赋差异以及政治因素等综合影响,沿线国家的经济风险具有很大的区域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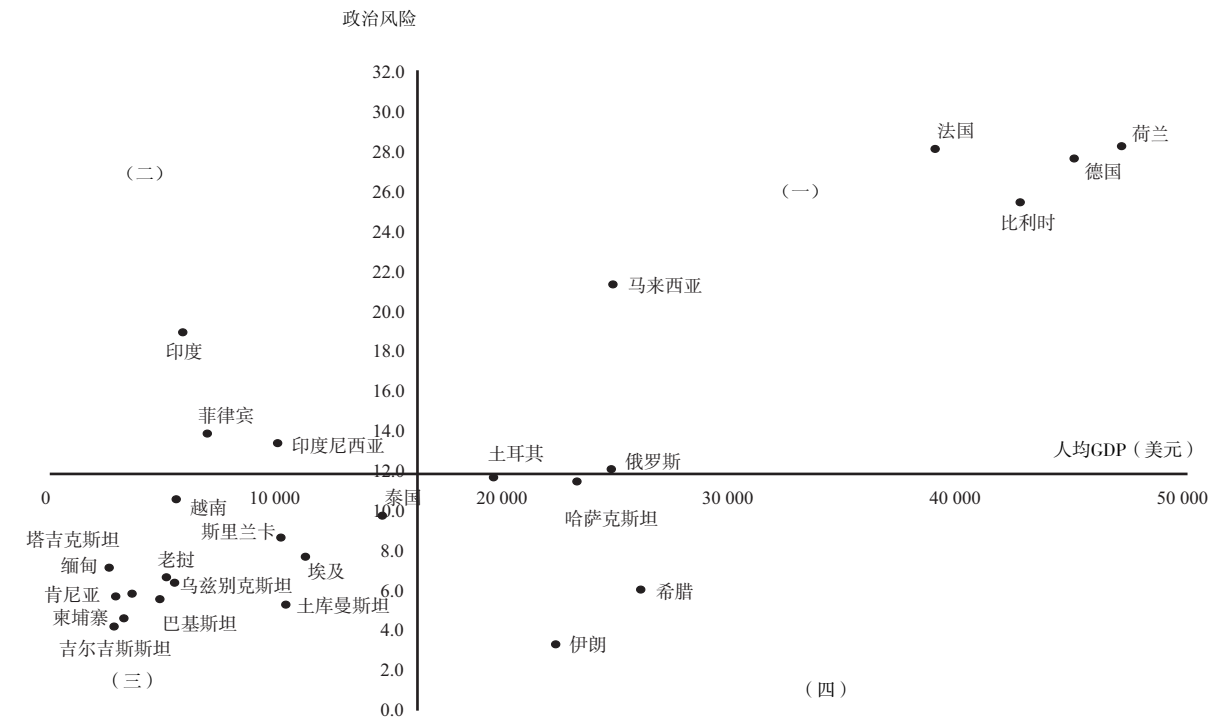


图 2 中诚信国际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分布图

资料来源：政治风险评分来自中诚信国际主权信用评级数据库，包括政治稳定性。<sup>[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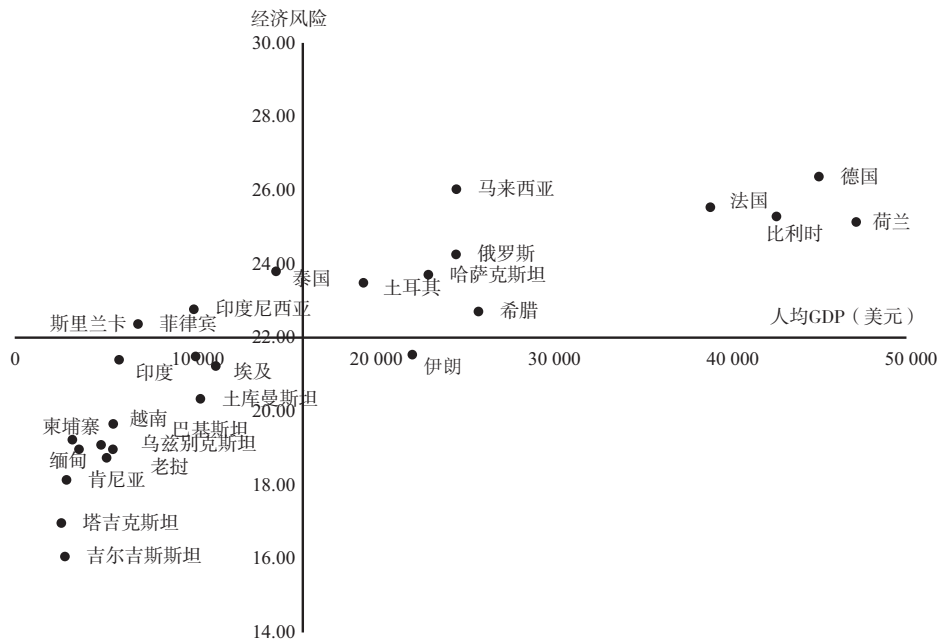


图 3 中诚信国际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风险分布图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下图同。

说明：横轴代表人均 GDP 水平；纵轴代表经济风险得分；原点为各国人均 GDP 与各类风险指标的平均值。第一象限、第二象限代表各类风险低于平均水平，第一象限、第四象限代表人均 GDP 高于平均水平。经济风险主要评分指标包括名义 GDP、人均 GDP、实际 GDP 同比增长、经济开放度、CPI 等。

此外,“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政保障能力较差,财政赤字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国家高企的债务比率、经济增长的乏力和非紧缩财政同时存在,偿债压力尤其是外债压力较高。加之一些国家汇率受国际影响较大,货币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容易导致资本外流以及资金成本

大幅变动,信贷和金融风险加大。从中诚信国际发布的评级报告来看(见图4),希腊、斯里兰卡、埃及等国的财政风险相对较高,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伊朗等国财政风险相对较低。经济风险和财政金融风险高,国际直接投资面临损失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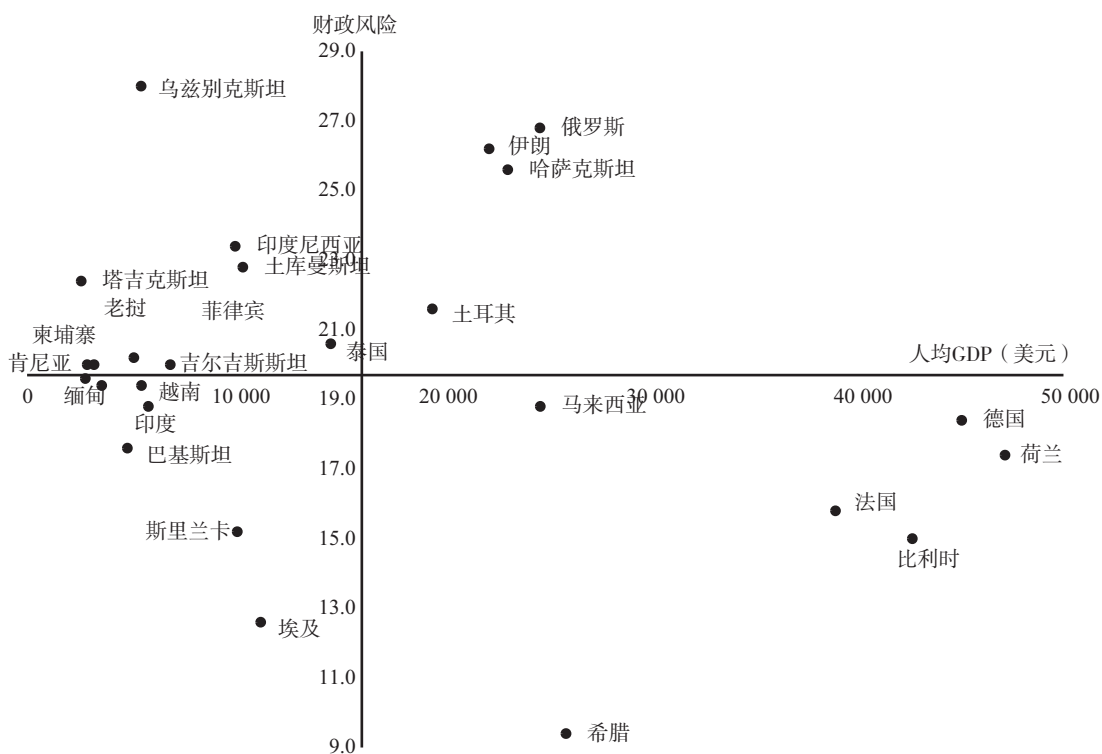


图4 中诚信国际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财政风险分布图

**(四) 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信息获取难度较大等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也加大了国际直接投资落地的困难**

除了上述问题,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以及信息透明度、信息获取难易等对国际直接投资落实而言至关重要。如图5所示,沿线国家铁路、公路和管道等通道能力有限,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互联互通能力差。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处于体制不健全、经济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部分国家信息公布渠道较窄、相对闭塞,因此信息获取难度加大。对于准备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企业而言,信息获取难度较大有可能加大企业运营难度,同时由于对国外的商业环境不熟悉、法律制度差异并不熟稔,也导致诸如“合同失效”之类的商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企业面临投资损失或者机会成本加大。

**(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行为缺乏国际规则约束, 增大国际直接投资的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复杂,这些国家大多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其他的国际多边的投资协定的成员国也极少,这些国家的行为缺乏国际通用规则的约束,给投资国进行国际投资带来较大的风险。如在地缘政治风险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投资国的项目不仅面临投资回报率较高的情况,甚至将面临较大的被国有化的风险。因此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可以借鉴国际投资的机遇以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同时加强国际沟通,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帮助本国进行制度改革,如改革不合理的投资管理体制,改善监管水平以及提升行政效率等,降低投资国投资的风险,提高本国投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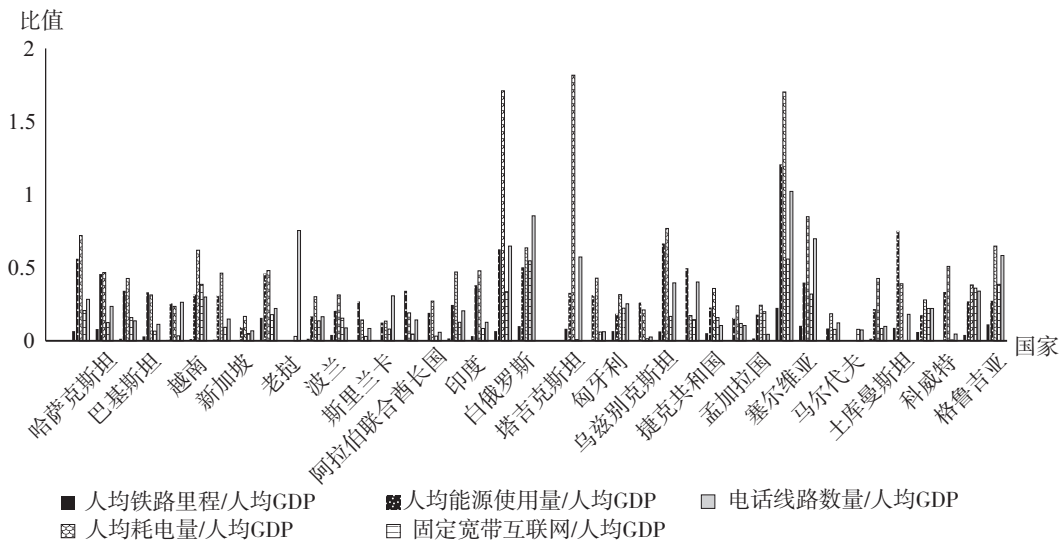


图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状况

虽然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进步具有推动作用，但由于沿线国家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合理制度安排的欠缺、不稳定的政治状况带来的政治风险，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以及财政保障能力较差带来的财政金融风险，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信息获取难度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行为缺乏国际规则约束等都给国际直接投资落地带来了阻碍。从理论上讲，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财政金融风险差异大甚至缺乏国际规则约束并不一定会导致国际投资无法收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这些国家存在有效的经济体制、稳定的市场环境，那么经济体系就能有机协调运作。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运行体制僵化，政治局面不稳定，经济运行就很容易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冲击，从而增加国际直接投资不能收回的风险。因此，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落地的制约因素来看，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市场体系的不健全是核心原因。通过制度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建立，促进投资环境的规范和成熟，可以降低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推动实现资本收益与风险的匹配。

#### 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破解吸引国际直接投资障碍的经验借鉴

从世界经济的历史来看，资本在全球范围

的流动和配置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常态，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不断发展，国际资本流动的双向特征更为明显。国际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由于制度不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备等使得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面临一些阻碍。从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尤其是通过吸引快速涌入的国际直接投资带来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等，与其脱离任何教科书范式的渐进式改革最为相关。

##### （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以及吸引FDI的成就与渐进式改革密切相关

从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稳定与快速发展，国民经济体系不断完善，初步建立了从无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综合实力得以大幅提升，经济的活力显著增强，居民收入实现大幅增加，社会民生也随之健全。<sup>[15]</sup> GDP总量从1978年的3 645.2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676 708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持续攀升，人均GDP到达7 940美元。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曾被誉为“亚洲的奇迹”。<sup>[16]</sup>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大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国内众多学者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可以有效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具体的影响途径有：国际直接投资会带动东道国政府和企业追加投资，

从而增加东道国当前的资本存量,中国资本形成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实际使用金额呈现正相关关系。另外,东道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包括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本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相关政策环境等,往往会影响到国际直接投资的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刘宏和李述晟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在长期和深层次上对研发、技术溢出、竞争和示范效应等方面的影响,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十分关键。<sup>[17]</sup>王冰和肖蓓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sup>[18]</sup>

虽然近几年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但在全球视野来看,中国的增速依然处于世界前列。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通过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俄罗斯学者认为1979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和各项经济政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动因”。<sup>[19]</sup>安德森(Anderson)指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动力是大规模的存款余额,这些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推动发展的资本来源,这些资本进入市场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sup>[20][21]</sup>其他学者认为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等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sup>[22][23][24][25]</sup>

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比较系统和严密的理论解释当属林毅夫等人的研究。林毅夫等人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sup>[26][27][28][29]</sup>他们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关键在于原有的经济模式被打破,新的经济制度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可以说“中国奇迹”能够发生的关键在于中国推行了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其中,中国过去发展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推行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以及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从而确保政治的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相互融合。<sup>[30]</sup>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利用外资,通过引进技术等方式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sup>[31]</sup>投资潮涌和技术跃迁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sup>[32]</sup>

## (二) 中国吸引 FDI 以及渐进式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对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很多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发展转型仍然是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有效的制度安排会提升效率和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以及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笔者认为,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到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革的结合。从理论来看,制度变迁可以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充分体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成熟的做法逐渐推广并制度化。比如从农村开始的自下而上的家庭联产承包制,释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通过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了国有企业发展的约束与激励机制。这些方式可以减少改革风险,以局部的、实验性的方式将试错的成本分散化,避免过大的失误。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不断出台力度较大的改革措施,比如政府机构改革等,逐步实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从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服务型政府转变。在增量改革和体制外突破的改革开放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双轨制改革,可以保证原有利益格局和利益主体不受到剧烈冲击,在此前提下逐渐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通过渐进式的或者“边际演进”的方式,在增量资产的配置上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促进了社会资源以先增量后存量的方式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sup>[33]</sup>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注重局部推进的非均衡发展 with 整体协调发展相结合。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资源禀赋特征差异,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非均衡推进的发展模式,通过分领域、分部门、分地区、甚至分企业等局部性的变化,形成从农村到城市,从非国有经济到国有经济,从沿海到内地的分层推进,最终形成经济体制整体转轨的路径。比



如,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首先是从东部沿海地区<sup>①</sup>开始,然后逐步扩展到内地。这种非均衡发展模式通过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极大提升了沿海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但在一定程度也造成了部门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均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政府在宏观调控上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引导产业在区域间的梯度转移和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从而发挥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政府的有所“作为”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对于政府的边界学术界争议颇多,但是从中国的实践来看,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适当的行政干预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改革的时机和力度、新旧制度的冲击等,需要政府的作用来保证制度变革的稳定衔接。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各项政策均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试错中进行,有效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机制的有机结合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市场和政府关系上,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一方面推动了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又发挥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避免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那样片面强调政府而一定程度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也避免了像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那样片面强调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sup>[34]</sup>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市场化改革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是最为成功的经验。通过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建立了基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对安全、公平的市场环境,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经济有序发展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基本保障。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和体制内循序推进的改革过程中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放权实行包干留

成的承包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再到现在产权制度的建立,相对完备的市场体系逐步形成。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其重要的特点,即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二者的兼容曾经是中国学术中争论不止的话题。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正是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这种兼容性,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对市场竞争形成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推动了国有企业市场化进程。

与此同时,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经济和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各个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会助长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sup>[35]</sup>因此,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必须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依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是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保证。

综上所述,中国通过吸引快速涌入的国际直接投资带来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等,与其脱离任何教科书范式的渐进式改革最为相关。而渐进式改革大大降低了由改革带来的风险成本,使得经济社会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保持持续的快速发展。那些处于经济、政治、体制多重转型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吸收借鉴我们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比如在改革中循序渐进,增量先行改革等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通过先沿海后中西部地区推进对外开放等非均衡发展提升发展水平,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通过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升。

---

① 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制度和政策作用下,外资的涌入一方面引进技术提高了东部沿海地区生产力,另一方面改善了当地的产业结构和居民就业状况。

## 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进行制度改革的框架性思考

###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追求改革成本最小化的渐进式改革

“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面临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政策调整等多方面的挑战。大多数国家的商业运营环境不佳，这些国家可将吸引国际资本当作提升本国发展的重要路径，但最基本的前提是要改善本国的营商环境，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可提供重要的经验借鉴。

改革必定带来利益的变动，而这也会直接引起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及对现有秩序的破坏。为避免改革所引起的利益不均衡及由此导致的不稳定，改革注定是具有过渡性质和渐进性的。根据转型经济学的理论，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在达到既定改革目标的前提下，寻求改革成本最低的路径。任何改革都是要支付一定的成本，而改革的成本又取决于改革方案在改变规则的同时，是否同时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以及改变了多少，触动了多少人的利益，还有损害的程度有多大。触动的人数越多，损害的程度越大，引起的反对改革的力量也就越大，改革成本也就越高，改革就越不容易成功。如进行激进式改革，完全推翻原有的旧制度，一方面，旧制度下的利益群体会形成阻碍改革进行的巨大势力；另一方面，因为无法试错，往往还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渐进式改革是从局部展开、部分试点试错再推广的逐步达成目标的过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改革的时候，同样有必要遵行这样的改革原则——追求改革成本最小化的改革路径。具体来说，渐进式改革的方法有两点可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借鉴：第一，增量改革。增量改革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两种制度，既允许现有制度在既有存量内继续运行，同时又在存量外建立新的制度。如“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种改革方式既可避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推进改革，同时也为原有制度提供一个参考系和评

价系统。现已在很多领域内得到实践，如中国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第二，特许改革或试验推广。在一定地区、某个产业甚至小到某个企业，进行局部的市场化试点改革，待取得示范效应后逐步推广。这样做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的风险，减少改革的成本，避免重大失误。如改革开放早期设立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已经成为可以推广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成功经验。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改革的框架设计

渐进式改革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改革的核心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之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若要提高其营商环境，还需要同时把握住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真正的市场化主体，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互助，而这四个方面是相辅相成、同时进行的。

1. 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真正的市场化主体，成为开放的经济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中国经济取得的重要成就，重要的一点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步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把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至过去不可比拟的高度，它不仅使各类生产要素总量空前增长，质量空前提高，而且使各类生产要素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历史与现实经验表明，与其他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体制，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最优途径。“一带一路”沿线有不少市场经济制度很不完善的国家，必须把握住这一改革目标，逐步提高本国的经济自由化和减少政府的干预程度。另外，要培育和发展真正的市场主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根本标志是，逐步培育和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如中国在农村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在城市对国有企业进行渐进式改革，逐步培养真正的市场主体。同时，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逐步改变本国与国际的关系，成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如中国从进口先进国家商品，到引进先进国家技术与管理经验，再到引进境外资本与企业，中国市场已经广

泛向国外开放, 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从出口商品、加工贸易、再到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中国经济已全面进入全球市场, 已经与世界经济全面融合, 而“一带一路”沿线有一些国家的市场开放度不够, 在贸易畅通方面, 还需要加快投资便利化的进程并消除一些领域的投资壁垒。

2. 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改革重要的前提和手段。中国的改革进程中, 从国务院、各部委到各地方政府, 均配合经济改革目标出台了大量的法律和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为市场化改革铺路, 也提高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风险保障程度。对于“一带一路”急需制度完善的沿线国家, 需要建立不同层次的法律和法律以加强本国的市场化改革, 有效保护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如在本国最高的法律层面, 要明确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同时在不同领域如金融、对外贸易、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建立以市场化为原则的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

3.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改革的重要机遇和方式。在当前国际交流密切以及逐步开放的国际关系中,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 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抓住国际投资的机遇以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 同时加强国际沟通,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帮助本国进行制度改革, 如改革不合理的投资管理体制, 改善监管水平以及提升行政效率等。在金融监管方面也要加强合作, 帮助本国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和稳定的金融市场, 从根本上促进国际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和公平性。

“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面临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政策调整等多方面的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若要吸引国际直接投资, 需要改善其投资环境, 而中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做法以及渐进式改革的经验可以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有效的可供参考的借鉴。上述国家进行制度改革后, 一方面可以改善本国的营商环境, 在法律法规、管理体制、监管体制等方面得到全方位的

提升, 可以降低投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 提高国际投资的稳定性, 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提高本国的经济增长水平。

## 六、小结

从全球经济发展历史和经验来看,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促进效应显著, 而“一带一路”战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吸取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然而, “一带一路”沿线周边国家很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落差极大, 投资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地区安全风险频发, 缺乏国际规则的约束, 等等, 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 最核心的风险是由于相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比较欠缺, 从而有可能出现投资无法收回的制度风险, 这些问题本质上与这些国家制度不完善紧密相关。

笔者认为, 中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成就以及渐进式的发展和改革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参考和借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大大降低了由改革带来的风险成本, 使得经济社会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保持持续快速发展。那些处于经济、政治、体制多重转型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吸收借鉴我们体制改革中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建设框架, 第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追求改革成本最小化的渐进式改革, 具体的改革方法有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以及特许改革或试验推广等。第二, 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培育真正的市场化主体, 成为开放的经济体, 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第三, 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改革的重要前提和手段。第四,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改革的重要机遇和方式。上述制度框架是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 也是可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制度建设和改革的重

要借鉴,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国际投资的风险,构建稳定的投资和营商环境,更可以从根本上提高

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

## 参考文献

- [1] X. Li, X. Liu.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Increasingly Endogenous Relationship [J].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 (3).
- [2] V. N. Balasubramanya, M. Salisu, D. Sapsfo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EP and IS Countries [J]. Economic Journal, 1996, 106 (434).
- [3] 葛顺奇, 罗伟.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基于模仿与创新的研究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1, (1).
- [4] J. H. Dunn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 London: Allen & Unwin, 1981.
- [5] C. G. Culem. The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Direct Investments among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88, 32 (4).
- [6] D. Kaufmann, A. Kraay, L. Zoido. Aggregating Governance Indicators [M]. Washington: World Bank, 1999.
- [7] 姚利民, 孙春媛. 中国逆向型 FDI 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 2007, (4).
- [8] 鲁明宏. 制度因素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一项实证研究 [J]. 经济研究, 1999, (7).
- [9] 雷建, 梅新育. 美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 [J]. 计划与市场, 2000, (3).
- [10] F. R. Root. Analyzing Political Risk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in Transition [M]. Detroit: Darwin Press, 1972.
- [11] H. Simon. Poland 1980—1982: Class Struggle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 [M]. Michigan: Black & Red, 1985.
- [12] 毛振华, 阎衍, 郭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报告 [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5.
- [13] J. Aizenman, Y. Jinjarak, H. Zhey. Chinese Outwards Mercantilism——The Art and Practice of Bundling [Z]. NBER Working Papers, 2015.
- [14] B. N. Ghosh, E. Li.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Investment Risk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J]. Economia Internazionale, 2009, 62 (1).
- [15] 毛振华, 张英杰, 袁海霞. 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的特征分析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6, (5).
- [16] P.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J]. Foreign Affairs, 1994, 73 (6).
- [17] 刘宏, 李述晟. FDI 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影响研究——基于 VAR 模型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 (4).
- [18] 王冰, 肖蓓. FDI 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J]. 对外经贸, 2012, (3).
- [19] A. 伊拉里奥诺夫. 中国奇迹的奥秘 [J]. 国外社会科学, 1999, (5).
- [20] J. Anderson. How to Think about China [EB/OL]. <http://bbs.jxj.org/thread-41036-1-1.html>, 2017-06-25.
- [21] J. Anderson. China's True Growth: No Myth or Miracle [J]. 中国改革论坛, 2006, (6).
- [22] 李富强, 董直庆, 王林辉. 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 [J]. 经济研究, 2008, (4).
- [23] 王宏彬.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 [J]. 当代经济, 2006, (3).
- [24] 刘小玄. 中国转轨经济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 [J]. 经济研究, 2003, (1).
- [25] 易纲, 樊纲, 李岩.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 [J]. 经济研究, 2003, (8).
- [26] 林毅夫, 刘明兴. 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 [J]. 经济研究, 2004, (7).
- [27] 林毅夫, 姜烨. 发展战略、经济结构与银行业结构 [J]. 管理世界, 2006, (1).
- [28] 林毅夫, 任若恩. 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讨论 [J]. 经济研究, 2007, (8).
- [29] 林毅夫.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30] 林毅夫. 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 [J]. 经济研究, 2007, (1).
- [31] 陈璋. 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学方法论的难点 [J]. 经济研究资料, 2005, (9).
- [32] 袁海霞. 中国经济增长与区域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的实证分析 [D].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09.



- [33]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J]. 经济研究, 1993, (9).
- [34] 林毅夫. 中国转型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 [EB/OL]. [http://www.qstheory.cn/politics/2014-10/14/c\\_1112815661.htm](http://www.qstheory.cn/politics/2014-10/14/c_1112815661.htm), 2017-09-14.
- [35] 张宇.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与经验 [J]. 教学与研究, 1998, (7).

(责任编辑: 刘舫舸)

## RESEARCH ON “ONE-BELT-ONE-ROAD” COUNTRIES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perience of China’s Gradually-advanced Reform

MAO Zhen-hua YUAN Hai-xia

(China Chengxin Group)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is the only route to allocating flowing fact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brings positive effects to push forward the host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As many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of “One-Belt-One Road” (OBOR) are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DI may help increase economic growth by facilitating their capital formation and raise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Considering the complexities and discrepancies among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ny OBOR countries, attracting FDI become more challenging for them. The fundamental issue here is that these OBOR countries are mostly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stage, which implies the lacking of normative standards for establishing a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the Opening-up Reform, China moved slowly but steadily and gradually accumulated its own reform experience, especially combining inductive institution evolution and compulsory institution evolution, leading to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by incremental reform and other measures, which all provided experience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OBOR countries.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e-Belt-One-Road; institutional reform